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 online
Journal of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http://xb.ynau.edu.cn
E-mail: ynndxbsk@qq.com

引文格式: 吴梦瑶, 戴理政, 梅莹. 土地转出的决定: 非农就业调节农地确权效果的研究[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2024, 18(0): 1−8.
DOI: 10.12371/j.ynau(s).202403102

土地转出的决定：非农就业调节农地确权效果的研究

吴梦瑶，戴理政，梅　莹*
(安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6)

摘要: 文章以 2020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为依托，从非农就业对农地确权和土地转出关系影响的理论分析出发，运用 Logit 模型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土地转出的影响和非农就业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1)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对农户土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具有时间的滞后性;(2)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非农就业对农地确权和土地转出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非农就业增强了农地确权对土地转出的正向影响。因此，为激活土地资源，推进乡村振兴，在保证农户的耕地权益和健全现行的耕地流转制度的基础上，还应多渠道促进农民实现非农就业，从而提升农户土地流转面积，实现农地规模经营。

关键词: 农地确权；土地流转；非农就业；调节效应；Logit 模型
中图分类号: F 30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Decision of Land Transfer: 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 Adjusting Agricultural Land Rights

WU Mengyao，DAI Lizheng，MEI Y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data of 2020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al Study (CHARLS), the paper used land transfer with the Logit model to test the impact of land ownership on land transfer and the adjustment effec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The study showed that: (1) the registr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contract right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mpact had time lag; (2) the regulation effect test showed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had a significant regul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land right confirmation and land circul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nhanced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agricultural land right confirmation on land circula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activate land resources and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le further protecting far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land and improving the existing land transfer policies, we should also promote farmers to achiev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so as to improve the land transfer area of farmers and realize the large-scale oper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Keywords: confirmation of farmland rights; land transfer; non-farm employmen; moderating effect; Logit model

收稿日期：2024-03-27　　修回日期：2024-04-19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贫困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研究”(SK2019A0129)。
作者简介：吴梦瑶(2000—)，女，安徽六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林经济管理研究。
*通信作者：梅莹 (1974—)，女，安徽宣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林经济管理、生态管理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推动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要素配置效率、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我国推出一系列关于土地流转的政策，土地流转成为农户获得收益、农村地区加快发展的保障。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指出加强对承包耕地的管理，支持推动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201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正式提出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政策要求；2015—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要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服务体系，鼓励多种形态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2023—202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保障农民利益的同时对于农村地区的流转承包制度提出了大稳定、小调整的新要求，以做到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扎实搞好确权，稳步推进赋权，有序实现活权，这意味着土地流转已然成为中央关注的基础性工作之一。随着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不断完善，2014—2022 年全国耕地流转面积从 0.269 亿 hm^2 增加到 5.32 亿 hm^2，农地流转率从 30.32% 上升到 34.08%。但在全国农地流转率持续上升的同时，农地流转的加速度却在减慢，2016 年全国土地流转率仅比 2015 年提高 1.8%，2022 年比 2021 年下降了 1.6%，远低于 2012—2014 年 4% 以上的年均增速。乡村振兴战略在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提出，而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从业人口逐步下降，随着 2017—2022 年农业从业人口从 2.03 亿降为 1.77 亿，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在保障农户权利的基础上促进土地流转，最大化利用土地，成了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点。

一、 文献回顾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自 2013 年开始确权颁证，农地的确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农户土地流转中的权利，因此不少学者将研究视角同时聚焦于农地确权与土地流转上，开始逐步从理论和实践出发来验证两者之间是否具有一定的因果影响关系。学者们大部分认为农地确权有助于促进土地流转[1]。一方面，农地确权不仅可以增强农民对土地的专有性预期，也能够规范农地流转的交易行为从而减少产权争议，稳定流转关系[2]，降低契约风险和交易成本[3−4]；另一方面，农地确权会通过农业生产激励和交易费用来抑制农户农地转出，并通过交易价格机制促进流转[5]，且市场深化会抑制禀赋效应的出现[6]，从而出现土地确权后产权强度提高越显著的农户流出土地的意愿越强的结果[7]。但也有学者认为承包地对农户而言，既具有商品属性，又具有情感属性，在禀赋效应的影响下，农户通常会高估承包地价值，不利于土地转出，确权强化了禀赋效应[8−9]，所以会抑制农地转出[10−11]。同时，部分学者探寻出土地确权在土地流转上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12−13]，原因主要集中于确权对于土地流转没有直接性的影响以及土地确权工作的滞后性。由此可见，虽然众多学者肯定了确权在农村改革和解决土地问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农地流转还受到社会保障水平[14]、区域经济发展水平[15]、家庭特征因素[16]、农地禀赋特征[17]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关于农地确权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结论，相关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深化。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劳动人口从事非农就业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常见的社会趋势，2000—2018 年，因城镇化的发展带来农村就业人口平均每户增加 26.7%。一些学者认为伴随着非农就业的增加，家庭要素禀赋结构会随之改变，非农就业会改变家庭要素禀赋结构，技术理念的愈发先进，工作机会的增加，非农就业时间和收入的改变，会促进土地的流转[18−19]。但也有学者认为农业收入下降或非农部门工资上涨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增加常见的两种动力源头，但能激活土地流转活力，促进土地流转的仅仅只有依靠非农部门工资上涨拉动力，而农业收入下降推动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因为抑制了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反而抑制土地流转[20]。孙小龙等基于吉林、山东和陕西 429 户农户的微观数据，实证验证家庭非农就业人数越多，土地转出面积越大[21]。苗海民等基于新家庭经济学相关理论，构建了在中国农村家庭半工半耕生产模式下，构建了土地流转微观理论框架，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实证分析也得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依然是土地流转的重要推手[22]。王玉斌等基于湘皖苏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实证研究认为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入有显著抑制作用但是对农地转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在通过促进农业

生产性服务发展又间接影响了农地流转行为[23]。栾江等通过对广东、河南等 5 省所做的农户调查分析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异质性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认为从总体上看，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地转入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对农地转出具有促进作用[24]。因此，在考察农地确权对流转影响时应将非农就业考虑进去，这对于推动农地流转、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推进农业规模化发展具有指导作用。但现有研究大多探究两两关系，较少将三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系统研究农地确权、非农就业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且多数研究者主要是基于县市级尺度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得到的观测数据较为有限。因此，本文基于非农就业调节农地确权对土地流转影响的理论机制，提出研究假说，并借助 2020 年 CHARLS 微观数据进行实证验证，明确非农就业对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的调节作用的大小，以期为乡村振兴背景下，通过推进非农就业促进农地流转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相关研究假说的提出

（一）农地确权对土地转出的影响

主流产权理论假定认为，在产权清晰且稳定的条件下，市场具有自动处理解决交易问题的能力。因此，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后通过农地市场流转达到农地经营的规模化成为可能。首先，地权稳定性消除交易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通过法律赋权的方式，明确界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进一步保护农户的承包权利，有效降低制度风险，从而推进土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育[25]。其次，农地确权强化了农户的排他性预期。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包含了土地信息的界定，明确了土地用途、“四至”和空间位置，并颁发土地承包权证书，为农户提供解决争端、维护权益的法律平台，强化了农户的排他性预期。再次，农地确权推动了流转政策的完善，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后，为促进成果的有效运用，相关政策制度不断完善, 农地流转交易平台逐步建立健全，流转交易流程也不断规范等，进一步减少了农地流转过程中产生的事前(搜集信息成本)、事中(谈判、协调和签约成本)、事后(实施合约和监督制裁成本)的交易费用[26]。但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作为一项国家正式制度，其实施的初始阶段可能会与当地传统习惯、风俗等非正式制度发生碰撞，因而农地确权成效的发挥会存在时滞；而且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后的农地转出，除通过法律赋权的方式稳定土地流转市场健康发育，还需要农户认知转化，农户认知的时滞，也会导致农地确权促进土地流转的政策目标实现具有滞后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1：农地确权对农户土地转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H2：农地确权登记颁证时间距离调查时间的间隔时长(简称间隔时长)对农户土地转出有明显促进作用，即农地确权对农户土地转出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随着时间推移，促进作用越明显。

（二）非农就业调节农地确权对土地流转影响

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下，承包地对农户而言具有收入功能、就业功能、预期功能和保障功能等多种功能，土地确权作为政策工具，要实现土地流转的政策目标受到农户对土地功能依赖的制约。从要素配置的角度来说，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是促进确权后农地转出的重要动因。首先，非农就业是农地转出的前提。当非农就业机会增多时，劳动力价值很容易在市场上变现，农户就会拥有重新分配劳动力、缓解人地矛盾、改善家庭生计的有效途径。作为理性小农，传统的通过土地调整获取保障和收益的意识也就会逐渐减弱，对土地的情感和生存依赖程度也会随之降低，从而促进土地的转出[27]。其次，非农就业是农地转出的保障。农户非农就业带来非农收入增加，从而弱化了土地原有的收入功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家庭非农收入的不断累积，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土地抵御风险的预期也会降低，减弱了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进而促进土地转出[28]。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3：土地确权与农地转出的关系受非农就业的影响，即非农就业对农地确权与土地转出的影响存在调节效应。

H4：间隔时长与土地转出的关系受非农就业的影响，即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农就业对农地确权与土地转出的影响调节效应越明显。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非农就业调节农地确权对土地转出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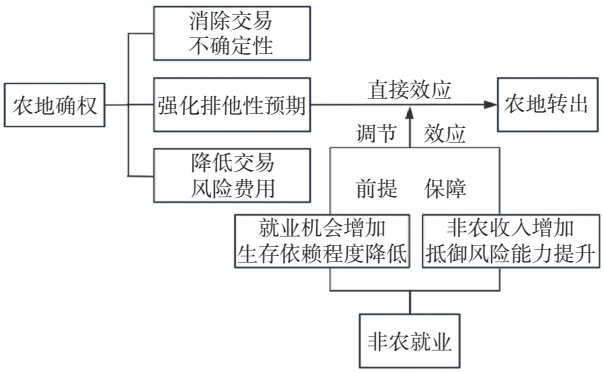

图 1 农地转出的影响机制图

三、 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最新调查数据。在分析前，本文对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1)选取户籍为农业户口的样本;(2)由于本文的分析单位是农户家庭单元，根据解垩等人的做法[29]，本文定义一个虚拟的“户主”，即将家庭中的主要受访者视为户主，现实中土地流转可以被区分为土地转入与土地转出。由于调查中大部分农户是将土地流转出去，所以本文设定的土地流转行为是农户转出土地行为。在去掉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最终使用的样本农户是 4 749 个。

（二）变量选择

本文主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变量为土地是否转出，采用问卷中“过去一年是否将土地出租给了其他人？”这一问题及相关选项进行衡量是否发生土地转出行为。本文核心自变量为农地是否确权登记颁证、间隔时长。其中农地是否确权登记颁证根据问卷中“有没有进行确权？”来衡量。间隔时长根据问卷中“哪一年对土地进行确权？”来确定，由于调查在 2020 年开展，因此本文用“间隔时长=调查年份−发放农地确权证书的年份+1”来计算。

此外，本文考察非农就业在农地确权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产生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由于农地转出决策属于家庭联合决策范畴，家庭是否转出土地以及转出多少土地，需要根据家庭而非个人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情况进行决定。因此，本文运用家庭层面的家庭年度非农就业收入总和作为衡量非农就业情况的一个指标。由于一个家庭农业收入比率越小，表明家庭成员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越小，“离地”的可能性越大，转出承包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选取非农业收入比率作为衡量非农就业的另一个指标，考虑到数据的获取，选取 CHARLS 数据中户主个人年度非农就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率来表示。为识别非农就业对农地确权、土地流转的调节效应引入交互项。另外，根据现有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选取包括个体特征(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婚姻状况、人口规模、农业机械价值)、地区变量三个部分的控制变量(表 1)。

（三）模型设定

首先根据理论假说 1，建立基准模型(1)，分析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

$$land_{it} = \alpha_0 + \alpha_1 policy_{it} + \alpha_i x_{it} + \varepsilon_{it} \tag{1}$$

式(1)中 *land* 表示土地是否转出，*policy* 表示农地是否确权颁证。

其次根据理论假说 2，建立基准模型(2)，分析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土地转出影响的时滞。

$$land_{it} = \beta_0 + \beta_1 year_{it} + \beta_i x_{it} + \varepsilon_{it} \tag{2}$$

式(2)中 *year* 为间隔时长。在式(1)(2)中，x 为控制变量，ε 表示服从正态分布的误差项。由于被解释变量是二元虚拟变量，因此采用 Logit 模型对式(1)(2)进行估计。

最后对式(1)(2)引入交互项，分析非农就业在农地确权颁证对土地转出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begin{aligned} land_{it} = {} & \alpha_0 + \alpha_1 policy_{it} + \alpha_2 occupation_{it} + \\ & \alpha_3 policy_{it} \times occupation_{it} + \alpha_i x_{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tag{3}$$

$$\begin{aligned} land_{it} = {} & \beta_0 + \beta_1 year_{it} + \beta_2 occupation_{it} + \\ & \beta_3 year_{it} \times occupation_{it} + \beta_i x_{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tag{4}$$

在式(3)(4)中，*occupation* 表示农户的非农就业程度，系数α_3、β_3即为非农就业的调节效应。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地确权对土地转出的影响

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估计农地确权对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采用了嵌套模型。模型Ⅰ为基准模型，用以估计农地确权对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模型Ⅱ检验了确权间隔时长对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由表 2 可以看出 Logit 模型的 Prob>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单位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土地是否转出	—	转出=1，未转出=0	0.168	0.373
核心解释变量		农地是否确权	—	确权=1，未确权=0	0.364	0.481
		间隔时长	年	确权年份至2020年的时间间隔	1.66	2.45
调节变量		非农收入占比	—	家庭非农收入除以家庭总收入	0.67	0.36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户主年龄	岁	户主的实际年龄	66.36	10.33
		户主受教育程度	—	小学及以下=0，初中=1，高中及以上=2	0.980	0.837
	家庭特征	婚姻状况	—	未婚=0，已婚=1	0.989	0.105
		人口规模	人	家庭实际人口数量	2.117	0.78
		农业机械价值	万元	家庭拥有的农业机械总价值	0.088	0.762
	地区变量	地区变量1	—	中部地区=1，其他地区=0	0.295	0.456
		地区变量2	—	西部地区=1，其他地区=0	0.351	0.477
		地区变量3	—	东北地区=1，其他地区=0	0.054	0.227

表 2　农地确权、非农就业对土地流转的交互影响

变量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模型Ⅳ	模型Ⅴ	模型Ⅵ
土地是否确权	0.603*** （0.078）		0.714*** （0.082）		0.382* （0.204）	
间隔时长		0.116*** （0.014）		0.129*** （0.015）		0.095*** （0.369）
非农就业			1.242*** （0.129）	1.211*** （0.129）	1.025*** （0.175）	1.109*** （0.163）
土地是否确权×非农就业					0.442* （0.250）	
间隔时长×非农就业						0.045 （0.045）
年龄			−0.009** （0.004）	−0.010** （0.004）	−0.009** （0.004）	−0.100** （0.004）
受教育程度			−0.041 （0.050）	−0.031 （0.050）	−0.040 （0.050）	−0.030 （0.050）
婚姻状况			0.689 （0.446）	0.645 （0.447）	0.706 （0.446）	0.708 （0.448）
人口规模			−0.101* （0.054）	−0.100* （0.054）	−0.101* （0.054）	−0.101* （0.054）
农业机械价值			−0.491** （0.238）	−0.454** （0.231）	−0.488** （0.239）	−0.455** （0.232）
地区变量1			0.195* （0.100）	0.209** （0.100）	0.191* （0.100）	0.239** （0.100）
地区变量2			−0.111 （0.103）	−0.090 （0.103）	−0.114 （0.103）	−0.093 （0.103）
地区变量3			0.271 （0.178）	0.335* （0.178）	0.286 （0.179）	0.336* （0.178）
常数项	−1.849*** （0.053）	−1.820*** （0.050）	−2.614*** （0.558）	−2.517*** （0.443）	−2.458*** （0.451）	−2.445*** （0.446）
*Prob>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N	4749	4749	4749	4749	4749	4749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10%水平上显著；“×”表示交互项；括号里为对应的标准误。

chi2=0，表明该模型的运算结果总体上在统计上检验显著。从模型Ⅰ可以看出农地确权对农户的土地转出有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值为 0.603，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即农地确权促进了农户的土地转出，证实了假说 1。从模型Ⅱ可以看出间隔时长对农户的土地转出同样具有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值为 0.116，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即间隔时长越长，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越强烈，这表明农地确权促进土地转出的效果有明显的时间滞后性，证实了假说 2。

（二）非农就业对农地确权影响土地流转的调节效应

为检验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模型Ⅲ中，农地是否确权、非农就业两个变量同时

进入模型，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在 1% 的水平下非常显著，这表明非农就业程度越高，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更强烈。而且，通过模型Ⅲ可以看出农地是否确权和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意愿都具有积极的影响，且两个变量的系数分别在 1% 的水平下显著。模型Ⅳ中，间隔时长、非农就业两个变量同时进入模型，结果显示间隔时长和非农就业对土地转出具有积极影响，且两个变量的系数仍然都在 1% 的水平下显著。

为检验非农就业在农地确权对农户土地转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模型Ⅴ在模型Ⅳ的基础上加入非农就业和农地确权的交互项。结果显示非农就业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土地确权、二者的交互项过了 10%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方向没有发生变化。由此可以得出非农就业在农地确权对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从而证实了假说 3。为检验非农就业在间隔时长对农户土地转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模型Ⅵ中，加入间隔时长和非农就业的交互项，结果发现间隔时长、非农就业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系数方向没有发生变化，但二者的交互项没有通过检验说明非农就业在间隔时长对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中调节作用不明显。此外，农地确权与非农就业的交互项为正，与主效应(农地确权对农户土地转出存在正向影响)的作用方向一致，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增强型交互关系，即非农就业增强了农地确权对农户土地转出的正向影响。

（三）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

从模型Ⅲ至模型Ⅵ的检验结果来看，“户主年龄”“人口规模”以及“农业机械价值”3 个控制变量对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显著。首先，户主年龄与农户土地转出呈负相关关系，并在 5%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家庭平均年龄越大的农户家庭越不愿意转出土地，这是因为农户年龄越大，非农就业的意愿和非农就业的可能性会下降，更倾向于通过拥有土地承包权来实现耕地保障养老和粮食安全，从而降低了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其次，人口规模与农户土地转出呈负相关关系，并在 10% 水平上显著，这是因为当家庭人口规模越大时，农户更愿意自己经营甚至转入土地扩大经营而非转出土地。再次，农业机械价值与农户土地转出呈负相关关系，并在 5%水平上显著。这是因为当农户拥有足够多的农业机械价值时更倾向于自己经营或者转入土地，转出土地的意愿也因此降低。此外，在模型Ⅲ至模型Ⅵ中，“地区变量 1”对农户转出土地的影响显著，然而在加入“间隔时长”变量后，模型Ⅳ相比于模型Ⅲ中“地区变量 3”在 10% 水平上显著，这也再次验证农地确权促进土地转出具有时间滞后性。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通过上述 2020 年 CHARLS 数据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对农户土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影响具有时间滞后性，农地确权登记颁证时间距离调查时间的间隔时长越长，农户土地转出越明显。调节效应检验证实非农就业对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和农户土地转出关系具有调节效应，非农就业在农地确权登记间隔时长对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中调节效果不明显。

（二）启示

1. 进一步深化农地制度改革，规范土地市场

由于有效的农地产权可以正向促进农地流转，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为盘活土地资源，促进土地流转，落实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推动土地资源的规范使用，保障承包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促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保护经营主体的土地经营权，提高其从事农业活动的积极性，通过保护各方权利，促进土地流转市场规范发展。

2. 进一步巩固农地确权成果，激活农地流转

土地确权促进农地转出具有滞后性，为促进土地流转，应充分运用土地确权成果，不断完善农村承包地制度体系。在完善农户确权登记工作、保障农户的土地权属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业务系统，拓展土地承包信息数据应用领域，做好确权登记信息系统的管理维护，实现农村承包地精准管理。并且在土地承包的过程中强化跟踪调查，简化流转环节、提升土地的资源利用率。推动实现承包地管理和服务工作数字化、信息化和常态化，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促进承包地流转规模化。

3. 多措并举，推进农户高质量非农就业创业

在乡村振兴推进中，为促进土地流转，增加

农户收入，应多措并举，推进农户高质量非农就业创业。政府应强化以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为目的的培训，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加强部门引导，落实政策扶持，健全帮扶措施，合理开发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产业化发展促进农户向本地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推动承包地流转规模化、稳定农户非农收入来源，减少农户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促进土地流转。

[参考文献]

[1] 崔益邻, 蒋妍, 赵江萌. 土地确权、要素配置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基于CHARLS2018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 农村经济, 2024(1): 45.

[2] 陈韵竹. 农地确权背景下农户要素联合配置问题研究: 基于CHFS面板数据分析[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3, 34(2): 63. DOI: 10.3969/j.issn.1007-7103.2023.02.017.

[3] 李虹韦, 钟涨宝. 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 基于确权制度可信度的调节效应分析. 资源科学, 2020, 42(9): 1657. DOI: 10.18402/resci.2020.09.02.

[4] 李金宁, 刘凤芹, 杨婵. 确权、确权方式和农地流转: 基于浙江省522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J]. 农业技术经济, 2017(12): 14. DOI: 10.13246/j.cnki.jae.2017.12.002.

[5] 林文声, 秦明, 苏毅清, 等. 新一轮农地确权何以影响农地流转: 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17(7): 29.

[6] 王士海, 王秀丽.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强化了农户的禀赋效应吗: 基于山东省117个县(市、区)农户的实证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5): 92. DOI: 10.13246/j.cnki.iae.2018.05.007.

[7] 纪月清, 杨宗耀, 方晨亮, 等. 从预期到落地: 承包地确权如何影响农户土地转出决策?[J]. 中国农村经济, 2021(7): 24.

[8] 罗必良. 科斯定理: 反思与拓展: 兼论中国农地流转制度改革与选择. 经济研究, 2017, 52(11): 178.

[9] 何东伟, 张广财. 土地确权与农地流转: 基于财富效应视角的考察[J]. 产业经济评论, 2019(1): 91. DOI: 10.19313/j.cnki.cn10-1223/f.2019.01.008.

[10] 许佳贤, 皮婷婷, 郑逸芳. 农地确权对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机理研究: 交易成本和禀赋效应的双重中介作用[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2, 43(11): 249. DOI: 10.7621/cjarrp.1005-9121.20221124.

[11] 黄佩红, 李琴, 李大胜. 新一轮确权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影响机理[J]. 农村经济, 2019(5): 17.

[12] 杨广亮, 王军辉. 新一轮农地确权、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 来自CHFS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22, 22(1): 129. DOI: 10.13821/j.cnki.ceq.2022.01.07.

[13] CHENG W , XU Y , ZHOU N , et al. How did land titling affect China's rural land rental market? Size, composition and efficiency[J]. Land Use Policy, 2019, 82609-619.

[14] 张忠明, 钱文荣. 不同兼业程度下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研究: 基于浙江的调查与实证[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 35(3): 19. DOI: 10.13246/j.cnki.iae.2014.03.004.

[15] 付江涛, 纪月清, 胡浩. 新一轮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是否促进了农户的土地流转: 来自江苏省3县(市、区)的经验证据[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6(1): 105.

[16] 何欣, 蒋涛, 郭良燕, 等. 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与农户流转农地行为研究: 基于2013—2015年29省的农户调查数据[J]. 管理世界, 2016(6): 79. DOI: 10.19744/j.cnki.11-1235/f.2016.06.007.

[17] 钟晓兰, 李江涛, 冯艳芬, 等. 农户认知视角下广东省农村土地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研究[J]. 资源科学, 2013, 35(10): 2082.

[18] 钱忠好. 非农就业是否必然导致农地流转: 基于家庭内部分工的理论分析及其对中国农户兼业化的解释[J]. 中国农村经济, 2008(10): 13.

[19] 许庆, 刘进, 钱有飞. 劳动力流动、农地确权与农地流转[J]. 农业技术经济, 2017(5): 4. DOI: 10.13246/j.cnki.jae.2017.05.001.

[20] 王丽媛, 韩媛媛. 劳动力回流与土地流转相悖吗: 论异质型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土地流转[J]. 经济问题, 2020(9): 18. DOI: 10.16011/j.cnki.jjwt.2020.09.003.

[21] 孙小龙, 郭沛. 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J]. 财经科学, 2015(11): 121. DOI: 10.3969/j.issn.1000-8306.2015.11.012.

[22] 苗海民, 朱俊峰.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农村劳动力选择性流动抑制了土地流转吗?[J]. 世界经济文汇, 2021(6):72. DOI:10.3969/j.issn.0488-6364.2021.6.sjjjwh202106005.

[23] 王玉斌, 赵培芳. 非农就业、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地流转: 基于湘皖苏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2, 43(2): 113. DOI: 10.7621/cjarrp.1005-9121.20220211.

[24] 栾江, 马瑞.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稳定性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迁移异质性视角[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 42(12): 203. DOI: 10.7621/cjarrp.1005-9121.20211222.

[25] 冯华超, 刘凡. 农地确权能提升村级土地流转价格吗: 基于全国202个村庄的分析[J]. 新疆农垦经济, 2018(3): 57. DOI: 10.3969/j.issn.1000-7652.2018.03.009.

[26] 李金宁. 确权与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D].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 2018.

[27] 章政, 祝丽丽, 张涛. 农户兼业化的演变及其对土地流转影响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20, 40(3): 168.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3.019.

[28] 李宁, 蔡荣, 李光勤. 农户的非农就业区域选择如何影响农地流转决策: 基于成员性别与代际分工的分析视角[J]. 公共管理学报, 2018, 15(2): 93. DOI: 10.16149/j.cnki.23-1523.2018.02.008.

[29] 解垩, 孙桂茹. 健康冲击对中国老年家庭资产组合选择的影响[J]. 人口与发展, 2012, 18(4): 47. DOI: 10.3969/

j.issn.1674-1668.2012.04.006.